

史铁丑,徐晓红,胡忠俊.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研究进展[J].江苏农业科学,2018,46(24):1-5.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8.24.001

#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研究进展

史铁丑<sup>1</sup>,徐晓红<sup>2</sup>,胡忠俊<sup>3</sup>

(1. 河北地质大学土地资源与城乡规划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31; 2. 河北地质大学商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31;  
3. 上饶师范学院历史地理与旅游学院,江西上饶 334001)

**摘要:**我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大国,我们的生存与发展无法与土地分离开来。梳理国内外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研究进展,总结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涵义、意义、土地生产率与土地规模大小的关系、土地流转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今后的创新研究方向,包括对不同规模农户农业生产中的全要素生产效率进行评价,明确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追求目标和服务主体,建立综合的计量模型与农户模型,深入探究土地流转与土地经营规模之间的关联,农户适度经营规模大小与农业补贴政策是否合适。

**关键词:**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土地生产率;土地流转

**中图分类号:** F30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302(2018)24-0001-04

在中国 13 亿庞大人口的基数下有一半以上归为农业人口。因此“三农”问题在提升公民整体素质,实现国家富强方面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然而农村地区由于其贫困和欠发达属性,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突破这一阻碍将加快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与和谐发展。

许多学者也认为,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小农经营制度与现代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市场机制按效率分配土地、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严重限制了我国农业发展,认为只有扩大土地规模,推广规模经营,才能推动农业进一步发展<sup>[1-2]</sup>。

我国政府也一直在鼓励和推进土地规模经营。早在 198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近些年来,政府又陆续发文指导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尽管中央鼓励土地流转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但目前我国整体的土地租赁市场并不普遍,而且区域差异明显。我国区域的自然、社会与经济条件差异明显,因此,研究各地区土地经营的适度规模、方式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对我国制订农业、农村发展政策大有裨益。因此,本研究将系统地梳理和总结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相关研究进展,凝聚已有研究共识,探讨未来可能的研究趋势与研究重点。

## 1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涵义

简单来讲,规模经营是指企业生产某种产品时达到了一定的产量,这个产量的标准来源于不同产业或部门的界定。适度规模经营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适合环境下,各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金、设备、经营管理、信息等)的最佳组合与有效运行,取得最优的经济效益。因为土地是农业

生产中不可替代的生产性资料,因此农业规模经营很大程度上即指土地规模经营。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指农业生产部门在适合的土地面积上的经营,即土地面积可以保证最优经济效益要求的经济。在这里重点是土地的面积规模,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所要求的土地面积并不是固定的,它随时间、地点而变化。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在我国沿海发达地区,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而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它与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并没有矛盾。

## 2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意义

### 2.1 理论意义

从农业内部发展来讲,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农户规模小且破碎、农业收入低且增收困难、农业劳动力质量下降等问题,想要解决这些农业问题,必须先解决农户的农业收入增长问题,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解决我国农业问题的很好政策,这样在农业内部有了规模经营的需求与动力。

从外部环境来讲,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产业,农户对农业与土地的依赖程度降低,这些变化客观上为土地的集中与合并创造了条件。农业中省工性技术的进步和推广,如机械化的普及和农药的推广,为农场规模的扩大提供了技术基础<sup>[3]</sup>。

在这种情景下,我国政府推行农户自愿基础上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顺应发展规律,我国已经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规模形式,但这些规模变化所要求的前提条件和所产生的影响尚不清晰,而且,落实到具体地域上,我国各地农业生产条件与经济条件差别迥异,各地农户适度的耕地规模须要进行理论上的深入探索,这种深入须要细化到具体作物,例如针对粮食作物与蔬菜作物,农户的合理土地规模是多少。

土地使用权与承包权的转移、农户土地规模的缩小或扩大,无论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都必然伴随着土地集约度和利用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产出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与农业技术效率和价格效率、土地所有权结构、农业改革等理论和实践紧密相连,在国家和农户层次上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18-03-25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编号:HB17GL018)。

作者简介:史铁丑(1978—),男,河北石家庄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土地利用变化研究。E-mail:shitiechou@163.com。

通信作者:徐晓红,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E-mail:xuxh81@126.com。

这些都是目前我国政府推行规模化经营时亟须解决的理论基础问题。

2.2 政策意义

近年来我国农业政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农民增收与粮食安全 2 个方面。

在当前我国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条件下,土地流转成为土地规模经营的主要举措,但是土地流转与土地规模经营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土地流转的主方向并不一定是从小农户向大农户流动,确定农户间土地流转的方向及影响因素,有助于我国政府有的放矢地制订政策,实现土地向“种田能手”与“种粮大户”流转。

2014 年中央颁布的关于土地有序流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指出,现阶段,对于土地经营规模相当于当地农户平均承包农地面积 10~15 倍的农户,应当重点扶持。如果按照农户平均 0.5 hm<sup>2</sup> 耕地计算,全国尺度上农户耕地的适度经营规模约为 6.67 hm<sup>2</sup>,这个规模是否合适,农业产出指标、劳动力收益指标等效率是否达到最优须要重点关注;另外,户均承包耕地达到目前的 10~15 倍,相当于 90% 以上的农户须要转出土地,土地转出户与土地转入户的生计变化,也须要重点关注,这也是中央政府一再强调土地流转以自愿为原则的主要担心点。

3 土地生产率和土地规模大小之间关系的研究

在农业生产中土地生产率和土地规模大小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学术界的争论持续至今,并且形成了观点相反的两派。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研究结论主要支持负向关系的存在<sup>[4-5]</sup>。Berry 对此还建立了统一的最小二乘法的回归模型:lg(Y)=a+blg(OP)+ε。式中:a、b 为系数;ε 为误差项;Y 为土地生产率,kg/hm<sup>2</sup>;OP 为实际耕作的土地面积,hm<sup>2</sup>;系数 β 值为负。也有研究发现,土地生产率与土地规模之间的负向关系并不严格,瑞定杰等对菲律宾的产出效率和农户规模的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结论为规模报酬存在先增加后减少的演变规律,拐点的面积是 4 hm<sup>2</sup><sup>[6]</sup>。

对土地生产率和土地规模间负向关系的解释,学者们普遍认为,影响土地产出率的主要因素是不同规模的农户在土地利用集约度特别是劳动投入方面的差异性。小规模农户土地与劳动力数量之间的比率较高<sup>[7]</sup>,而且市场不完善,很难充分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致使小规模农户劳动力的边际成本

经常要低于市场工资<sup>[8]</sup>,而大规模农户存在劳动激励与监督的问题,同时还受到季节性就业的刚性制约,致使劳动投入在质与量上和小规模农户相比差异明显<sup>[9]</sup>。相对于大规模农户,小规模农户的劳动力价格更低、土地价格更高<sup>[10]</sup>。在农业生产中,小规模农户更希望使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而大规模农户更愿意采用土地密集型生产方式<sup>[9]</sup>。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众多文献开始质疑土地生产率-土地规模之间负向关系的结论。其质疑主要依据 2 个方面的论据:(1)土地质量的差异性。研究认为,如果将土地肥力因素一并考虑,土地生产率与规模间的负向关系将减弱甚至消失<sup>[8,11]</sup>。(2)科技因素对劳动密集型生产的影响。对日本<sup>[12]</sup>和印度<sup>[13]</sup>的研究表明,随着机械化与技术水平的发展,土地生产率与土地规模间的负向关系有弱化甚至改变的可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农业经营的规模报酬问题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形成了少有的学术论战<sup>[2,14-15]</sup>。多数研究认为,我国农业生产并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sup>[16-18]</sup>,但土地形成规模经营后,有助于扩大机械化,减少土地撂荒面积,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生产效益<sup>[19-20]</sup>,从而解决我国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问题,从此角度出发,学术界多赞同对我国农业进行规模经营。但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地少人多,主张我国农业走依赖于生化技术进步的节约土地型发展道路<sup>[21-23]</sup>或劳动密集型道路。

尽管多数学者与政府均支持土地规模经营,但在土地经营的适度规模方面,目前研究的结果差别迥异(表 1),使用的评价载体、评价指标、评价对象等也有所不同。评价载体包含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等;在评价对象方面,多以农户与单个农业劳动力为评价单元;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资金生产率、生产效益等;评价方法包括农户模型法、统计分析法、生产函数法等。

一个较为统一的结论是,我国农户现拥有的土地数量与土地的适度经营规模之间还有较大的差距。

4 土地流转的研究

在目前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安排下,土地流转成为农户扩大经营土地规模的主要途径,也被认为是提升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促进农业产业化、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

表 1 我国土地适度经营规模的研究结果

评价载体	评价指标	研究区域	研究结论	数据年份
粮食	生产净收益	江苏省铜山县	14.17 亩	2006 <sup>[20]</sup>
粮食	粮食生产效率	吉林省中部	呈“U”形曲线,0~0.2,0.2~0.4,6.7~7.3 hm <sup>2</sup> 效率最高	2007 <sup>[24]</sup>
粮食	生产净收益	粮食主产区 10 省	39.85~122.16 亩	2002 <sup>[25]</sup>
粮食	土地生产率	吉林省	30 亩	2004—2006 <sup>[26]</sup>
粮食	家庭粮食总产量	河西走廊 4 市	5.23 hm <sup>2</sup>	2010 <sup>[27]</sup>
农业	综合评价	甘肃省临夏县北塬地区	0.66 hm <sup>2</sup>	2012 <sup>[28]</sup>
种植业	生产净收益	山东省无棣县侯家村	0.86 hm <sup>2</sup>	2013 <sup>[29]</sup>
劳动力	综合评价	全国	1.68 hm <sup>2</sup>	1996 <sup>[30]</sup>
劳动力	生产净收益	湖北省 6 县、市	江汉平原 2.84 hm <sup>2</sup> ,大别山区 1.90 hm <sup>2</sup>	2008—2009 <sup>[31]</sup>
劳动力	生产净收益	新疆阿克苏地区	2.07 hm <sup>2</sup>	2012 <sup>[32]</sup>
劳动力	生产净收益	江汉平原	2~6 hm <sup>2</sup>	2016 <sup>[33]</sup>

注:表中数据采用了原有格式,1 hm<sup>2</sup>=15 亩。

必然选择<sup>[34-35]</sup>。土地流转还具有边际产出拉平效应、交易收益效应,有利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sup>[36]</sup>。然而,现有的农村调查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缓慢,土地流转不规范,尤其在经济落后地区,这些问题更是普遍存在<sup>[37-39]</sup>。

尽管政府鼓励土地流转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但目前我国整体的土地租赁市场并不普遍,而且区域差异明显。农业部的调查发现,1992 年全国土地转让、转包农户与耕地面积占农户总量与耕地面积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2.3% 和 0.9%。第 2 次中国农业普查的数据表明,2006 年我国出租耕地农户占比为 6.9%,租入农户占比为 8.2%,租入耕地占总耕地面积比例为 10.8%,从区域上看,我国南方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出租土地的农户比重较大<sup>[37]</sup>,而西藏至山东的中纬度省份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比例显著较低,华北平原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占比仅约 3%。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缓慢和显著的区域差异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

针对我国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学者们进行了积极探讨。已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探讨了土地流转市场发育迟缓的原因,取得了许多结论。当前农地产权制度存在明显缺陷,主要表现在土地产权不明确,严重抑制了土地流转的交易<sup>[40-41]</sup>。一些研究表明,提升农民非农就业率能够促进土地流转,土地流转需要相对更加自由的劳动力市场<sup>[42-43]</sup>,而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劳动力就业市场受限从而会抑制土地流转<sup>[44]</sup>。另外,乡村干部对土地承包权频繁调整也会严重抑制土地流转<sup>[45-46]</sup>。

也有不少学者从微观层面对农户的土地流转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农户的兼业行为普遍存在,如果家庭生产达到最优,则会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sup>[47]</sup>。另外,家庭、户主、土地的特征,经济及区位因素等都对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影响显著<sup>[43,48-49]</sup>。此外,土地与粮食价格、土地租金也会对农户参与耕地流转产生影响<sup>[50]</sup>。

由此可见,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得益于劳动力流失过程中促进的土地流转,但兼业化经营、服务出租与集中现象往往会阻碍土地流转的进程<sup>[51]</sup>。由于农户平均土地规模狭小,过高的交易成本导致土地规模形成困难<sup>[52-53]</sup>。我国部分省份的土地流转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土地利用也开始出现规模经营的现象,广东、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的省份尤为突出<sup>[54]</sup>。诚然,土地流转涉及到土地使用权的转移,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变化涉及到家庭资源的优化再配置,反映到土地利用变化上,则是投入产出以及种植结构的变化。从宏观角度讲,这种变化涉及到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甚至会影响粮食安全,从微观角度讲,这种变化涉及到农户生计问题,与农户的社会保障等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对我国农户土地流转及其规模经营变化进行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国家和农户层面上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5 简要评论与展望

### 5.1 土地生产率与土地规模的关系

小规模农户和大规模农户哪个效率更高,即生产率和土地规模的关系问题,已有研究并未得到统一的结论。而且,研究多集中于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或生产效益,对农业生产

中的资本投入、机械投入、化肥投入等其他农业投入的关注不够。因此,在讨论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有必要对不同规模农户的农业全要素生产效率做出评价。

### 5.2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评价指标和方法

对于适度规模经营,目前的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多样,得出的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须对不同区域进行系统分析。在当前的人地关系条件下,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所追求的目标,是以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提高效率为主,还是以稳定并增加粮食产量为主?在服务主体上,是以服务政府为主,还是服务农户为主?这个问题显然是确定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方向的前提,须要首先研究明确。毋庸置疑,农户是我国农业经营的主体,以农户生计为基础的农户模型是考察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的一个重要工具,在此方面也需要将农业经济学与地理学相结合,在不同区域进行分别考察。

而且,目前针对我国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研究,空间上多以某一特定区域为主,时间上多以单一时点的农户调查为主,缺乏全国范围长时间尺度的大样本数据分析;在评价指标与研究方法上,也需要更明确、细化,建立综合的计量模型、农户模型进行研究。

### 5.3 土地流转的研究

对于土地流转,目前以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分析为主,但通过比较地理学的方法分析不同区域土地流转规模及其对农业生产影响的研究很少。地租理论是地理学中土地资源配置的经典理论,但目前的研究中应用地租理论对土地流转问题的研究较少。同时,现有研究对土地流转与土地经营规模之间关联的注意度不够,而且少有研究对农户转入耕地后如何利用进行深入探究。

### 5.4 农业补贴政策

对于农业补贴政策,目前我国的农业大机械补贴、种粮大户补贴等农业政策均有利于大规模农户,2012 年,我国农业规模经营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为 13.35 hm<sup>2</sup>,而 2014 年关于农地经营权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指出,当前应该优先扶持相当于当地户均承包耕地面积 10~15 倍的农户,这些政策与规模是否合适,当前相关研究少有涉及,也要作出更细化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 参考文献:

- [1] 陈杰,苏群. 土地流转、土地生产率与规模经营[J]. 农业技术经济,2017(1):28-36.
- [2] 佟绍伟. 准确把握土地“适度规模经营”[J]. 中国土地,2017(4):15-17.
- [3] 贾生华,田传浩,张宏斌. 农地租赁市场与农业规模经营——基于江、浙、鲁地区农业经营大户的调查[J]. 中国农村观察,2003(1):37-45.
- [4] Heltberg R. Rural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the farm size-productivity relationship: evidence from pakistan [J]. World Development,1998,26(10):1807-1826.
- [5] Weiss C R. Size, growth, and survival in the upper Austrian farm sector[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1998,10(4):305-312.
- [6] 瑞定杰,康赛优. 对菲律宾土地改革的再思考[M]//迟福林. 走入 21 世纪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176-178.

- [7] Feder G. The relation between farm size and farm productivity; the role of family labor, supervision and credit constraint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5, 18(2): 297–313.
- [8] Carter M R. Identification of the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 size and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easan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84, 36(1): 131–145.
- [9] 弗兰克·艾利思. 农民经济学——农民家庭农业和农业发展[M]. 胡景北, 译. 2版.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6: 312–316.
- [10] Cornia G A. Farm size, land yields and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unction; an analysis for fifteen developing countries[J]. *World Development*, 1985, 13(4): 513–534.
- [11] Newell A, Pandya K, Symon J. Farm size and the intensity of land use in Gujarat[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97, 49(2): 307–315.
- [12] Hayami Y, Kawagoe T. Farm mechanization scale economies and polarization – the Japanese experienc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9, 31(2): 221–239.
- [13] Deolalikar A B. The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farm size; a test using regional data from India[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81, 63(2): 275–279.
- [14] 张光辉. 农业规模经营与提高单产并行不悖——与任治君同志商榷[J]. *经济研究*, 1996(1): 55–58.
- [15] 孙自铎. 农业必须走适度规模经营之路——兼与罗必良同志商榷[J]. *农业经济问题*, 2001(2): 32–35.
- [16] 万广华, 程恩江. 规模经济、土地细碎化与我国的粮食生产[J]. *中国农村观察*, 1996(3): 31–36.
- [17] 罗必良, 汪 沙, 李尚蒲. 交易费用、农户认知与农地流转——来自广东省的农户问卷调查[J]. *农业技术经济*, 2012(1): 11–21.
- [18] Wan G H, Cheng E J. Effects of land fragmentation and returns to scale in the Chinese farming sector[J]. *Applied Economics*, 2001, 33(2): 183–194.
- [19] 易永锡. 对我国当前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研究[J]. *市场论坛*, 2005(12): 25–26.
- [20] 胡初枝, 黄贤金. 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生产绩效的影响分析——基于江苏省铜山县的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07(6): 81–84.
- [21] 罗伊·普罗斯特曼, 李 平, 蒂姆·汉斯达德. 中国农业的规模经营: 政策适当吗[J]. *中国农村观察*, 1996(6): 17–29.
- [22] 林毅夫.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34–236.
- [23] 黄宗智, 彭玉生. 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4): 74–88.
- [24] 张忠明, 钱文荣. 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粮食生产效率关系实证研究[J]. *中国土地科学*, 2010, 24(8): 52–58.
- [25] 钱贵霞, 李宁辉. 粮食主产区农户最优生产经营规模分析[J]. *统计研究*, 2004, 21(10): 40–43.
- [26] 辛良杰, 李秀彬, 朱会义, 等. 农户土地规模与生产率的关系及其解释的印证——以吉林省为例[J]. *地理研究*, 2009, 28(5): 1276–1284.
- [27] 金生霞, 陈 英, 杨倩倩, 等. 河西走廊农地适度经营规模计量研究——基于578农户调查的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2, 26(11): 6–11.
- [28] 赵亚南, 陈 英, 刘书安, 等. 西北地区农地适度经营规模研究——以甘肃省临夏县北塬地区为例[J]. *中国农学通报*, 2014, 30(26): 53–57.
- [29] 佟光霁, 冯艳芝. 山东省无棣县侯家村农地适度经营规模研究[J]. *经济师*, 2014(10): 151–153.
- [30] 张 侠, 葛向东, 彭补拙. 土地经营适度规模的初步研究[J]. *经济地理*, 2002, 22(3): 351–355.
- [31] 杨钢桥, 胡 柳, 汪文雄. 农户耕地经营适度规模及其绩效研究——基于湖北6县市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J]. *资源科学*, 2011, 33(3): 505–512.
- [32] 刘 娟, 王志彬. 农户耕地经营适度规模研究——基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实证分析[J]. *江苏农业科学*, 2014, 42(5): 429–431.
- [33] 王媛媛, 刘 颖, 陈 实. 规模报酬、产出利润与生产成本视角下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基于江汉平原354个水稻种植户的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017(4): 83–94.
- [34] Tan S, Heerink N, Qu F. Land fragmentation and its driving forces in China[J]. *Land Use Policy*, 2006, 23(3): 272–285.
- [35] Carter M R, Yao Y. Local versus global separability in agricultural household models; the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effect of land transfer rights[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2, 84(3): 702–715.
- [36] Yang 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nd lease market in rural China[J]. *Land Economics*, 2000, 76(2): 252–266.
- [37] Tan M, Robinson G M, Li X, et al.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bility of farm size in China in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J]. *Chin Geogra Sci*, 2013, 23(5): 607–619.
- [38] 包宗顺, 徐志明, 高 珊, 等. 农村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以江苏省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4): 23–30, 47.
- [39] 邵明亮, 黄季焜. 不同类型流转农地与农户投资的关系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1(4): 9–17.
- [40] Li G, Rozelle S, Brandt L. Tenure, land rights, and farmer investment incentives in China[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8, 19(1/2): 63–71.
- [41] Mullan K, Grosjean P, Kontoleon A. Land tenure arrangements and rural – urban migration in China[J]. *World Development*, 2011, 39(1): 123–133.
- [42] Long H L, Liu Y S.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7: 387–391.
- [43] Kung K S. Off – farm labor markets and the emergence of land rental markets in rural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 30(2): 395–414.
- [44] 陈园园, 安祥生, 任 媛, 等. 欠发达山区土地流转的生态效应分析——以晋西北地区为例[J]. *水土保持研究*, 2018, 25(2): 370–375.
- [45] 钱忠好.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残缺与市场流转困境: 理论与政策分析[J]. *管理世界*, 2002(6): 35–45.
- [46] 钱忠好. 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的困境与乡村干部行为——对乡村干部行为的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03(2): 10–13.
- [47] 钱忠好. 非农就业是否必然导致农地流转——基于家庭内部分工的理论分析及其对中国农户兼业化的解释[J]. *中国农村经济*, 2008(10): 13–21.
- [48] Deininger K, Jin S. The potential of land rental market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5, 78(1): 241–270.
- [49] 郝海广, 李秀彬, 田玉军, 等. 农牧交错区农户耕地流转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农业工程学报*, 2010, 26(8): 302–307.

郑建明,廖尹航. 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治理问题考察及其对策[J]. 江苏农业科学,2018,46(24):5-9.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8.24.002

# 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治理问题考察及其对策

郑建明,廖尹航

(上海海洋大学文法学院,上海 201306)

**摘要:**对国外水产品可追溯技术的强制性要求的认识,以及国内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正引起我国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对可追溯水产品的广泛关注和重视。通过对水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水产品监管部门设置与运行以及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技术应用情况的现状分析,进一步从这 3 个角度对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存在的问题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存在水产品质量可追溯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依然严重缺失、监管部门分工不明确的多头管理现象,水产品可追溯技术体系开发和应用落后、技术平台分散而不统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治理,可以从 3 个角度开展工作:第一,要建立统一的水产品可追溯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第二,政府管理部门要明确权属、合理分工,建立合理的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治理结构;第三,国家要建立统一的可追溯技术平台并且推广实施。

**关键词:**国内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法律法规;标准体系;治理结构;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TS20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8)24-0005-05

2002 年,欧盟颁布了《食品基本法》178/2002 法案,由此起始水产品可追溯制度的强制性要求。随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也纷纷对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作出明确规定,水产品可追溯体系建设纷纷上升为各个国家的层次。从 21 世纪以来,以水产食品质量为重点的调查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这主要是由于渔业在巩固中国食品安全和国际贸易形象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sup>[1-2]</sup>。国外发达国家水产品可追溯制度的强制性要求,正在倒逼我国出口水产品必须建立可追溯体系。随着水产品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日益提高,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正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而水产品可追溯制度是有效解决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政策工具之一。因此,认清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政府治理的现状及其问题,并进一步分析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在新时代背景下,水产品安全监管正越来越向水产品安全治理理念转变,国外学者在水产品可追溯治理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可追溯能解决食品安全信息不对称问题并能有效控制食品质量安全,食品可追溯体系被认为是可以向消费者传递食品质量与安全信息、识别食品安全风险来源的一个

有机体或平台<sup>[3]</sup>。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的应用,能够减少食品安全问题的影响范围以及发生问题后的成本,加强企业的责任感以及对相关信息的公布是该系统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原因<sup>[4-5]</sup>。阻碍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食品安全丑闻一直是一个主要的研究课题,这些研究主要是要揭开中国食品安全政策的弱点和根本缺陷<sup>[6-7]</sup>。任何有关水产品可追溯方面的标签计划,无论是自愿的还是立法的,规范监管是为了防止滥用和欺诈<sup>[8]</sup>。水产品质量安全一直是世界相关国际组织关注的焦点,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和一些渔业组织为此开展了多项研究。2003 年,FAO 对海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与评估进行了研究<sup>[9]</sup>。2005 年,FAO 将现代分析技术应用于保障海产品的安全性与可认证性<sup>[10]</sup>。2007 年,NEAFC(North East Atlantic Fisheries Commission,即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专门召开了关于鱼和渔产品追溯体系的会议,为可追溯体系在渔业管理中的应用出谋划策<sup>[11]</sup>。2008 年,FAO 水产养殖认证指南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召开,重点研讨并形成《FAO 水产养殖认证指南》终稿,这对于提高水产养殖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sup>[12]</sup>。近年来,FAO 组织专家对当前全球水产可追溯体系的实践情况进行了广泛而卓有成效的研究<sup>[13-15]</sup>。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我国水产品可追溯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国内学者对水产品可追溯政府治理的研究正处于呼吁和展望阶段,集中于对可追溯体系作用的描述和政策建议。可追踪系统的建立必须依靠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共同发挥作

收稿日期:2018-04-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编号:14YJCZH224)。

作者简介:郑建明(1975—),男,浙江衢州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Tel:(021)61900559;E-mail:jmzheng@shou.edu.cn。

[50]赵晓秋,李后建. 西部地区农民土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9(8):70-78.

[51]杜文星,黄贤金. 区域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差异及其驱动力研究——以上海市、南京市、泰州市、扬州市农户调查为例[J]. 资源科学,2005,27(6):90-94.

[52]Fleisher B M, Liu Y. Economies of scale, plot size, human capital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ese agriculture[J].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1992,32(3):112-123.

[53]罗必良,汪沙,李尚蒲. 交易费用、农户认知与农地流转——来自广东省的农户问卷调查[J]. 农业技术经济,2012(1):11-21.

[54]叶琪. 我国沿海地区农地规模经营模式比较[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4):443-447.